

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与西南联大之比较^{*}

潘懋元,石慧霞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与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坚持在后方培养人才的两所著名高校。两校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都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安定而自由的学术环境,都汇集了一批学术大师和优秀学生,培养出大量的杰出人才。但两校校长的教育理念同中有异,两校也有各自的办学特色。比较和探讨两校之异同及其得失,有助于深化抗战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对当前的大学改革也有重要启迪。

关键词:抗战时期;厦门大学;西南联大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8)05-0048-07

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三种类型的教育:后方教育、沦陷区教育、根据地教育。西南联大(以下简称联大)和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以下简称长汀厦大)是后方的两所著名高校。联大因其雄厚的师资和惊人的办学成就在中国教育史上大放异彩;长汀厦大因其显著的办学成绩受到当时教育部通令嘉奖,被称为“国内最完备的大学之一”,^[1]被国外学者赞誉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两校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和困难,实施了高水平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弦歌不辍,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学者对于联大的研究可谓卷帙浩繁,但对长汀厦大等其他同一历史时期的著名大学关注并不多。研究长汀厦大的办学历史和成就,比较它与西南联大之异同,能够进一步丰富对抗战时期中国大学办学历史和特色的研究,对当前的大学改革也能提供借鉴。

一、艰难的历史时期创造出安定而自由的学术环境

在战争环境下,办学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长汀厦大和西南联大都经历了举校内迁的动荡、物质匮乏的考验,但两校师生都能够摆脱外界的不良侵扰,坚持进行自由的学术探讨,以积极乐观的

^{*} 收稿日期:2008-03-10

作者简介:潘懋元,男,广东揭阳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慧霞,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厦门大学校友总会职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1944年3月,美国地质地理学家葛德石造访长汀厦大,曾作公开演讲,并为选修经济地理学课程同学讲学。葛氏参观厦大后称赞不置,谓“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参见《厦大通讯》6卷3期,1944年3月31日。

精神状态和生动活跃的校园文化,创造出安谧而自由的学术环境。

(一) 举校内迁

为维持战时高等教育,北大、清华、南开和厦大都进行了艰难的举校搬迁。偏于东南一隅的厦大为了照顾东南地区学子就学方便,选中闽西和赣南交界处的山城长汀为厦大迁校地址,制订了周密的迁汀计划,在搬迁前将校内各项重要文件、图书、仪器等陆续装箱,寄放于较为安全的“公共租界”鼓浪屿。在内迁高校中,厦大是准备较为充分,从容地完成迁校过程的少数高校之一。1938年1月12日,厦大师生员工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八百里,前后有序地抵达长汀。1月17日即开始复课,2月28日起各系严格举行1937年度上学期的学期考试。^[2]由于厦大内迁一次到位,图书资料的损失较少。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1942年10月曾逗留长汀厦大。他在日记中写道:“饭后参观各科实验室,设备均佳。……是日上午,蛰存领余参观厦大图书馆。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据云语言、文学为林语堂、生物为林惠祥所购,故有底子。人类学书亦富。中文则丛书甚多,地志亦不少,顾颉刚所购。金文亦不少。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3]

相比而言,北大、清华、南开的迁校较为仓促,还要考虑三校的协调和配合,规模大、人数多、距离远,更为艰难。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平津沦陷。三校校长即与教育部商议,在长沙创办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几经波折,历尽千辛万苦,前后近三个月时间陆陆续续抵达长沙。临时大学上课的第一天,校园里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接着南京失守,武汉告急,长沙也处于危急之中,临时大学被迫再次搬迁至昆明。^[4]值得庆幸的是,三校迁至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学校基本稳定下来,教学秩序很快恢复。

(二) 保障基本生活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论是长汀厦大还是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水平,与迁校之前相比都大幅下降。国民政府给来自沦陷区、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提供了战区贷金和社会捐助的救济金。当时两校持助贷金和救济金生活的学生一度达到在校生的70%以上。^[5]长汀厦大一位获得贷金的学生回忆说,当时他们在学校食堂吃米饭和青菜都不用交钱,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到毕业时,由于法币贬值,所欠贷金已微不足道,教育部通知所有贷金无需归还。两校通过多种可能渠道帮助学生解决生活难题。学校派专人到产粮区采购大米、黄豆,提倡吃糙米饭,学校自制豆腐,增加师生营养。1939年,厦大多方争取到的补助有:教育部贷金及免费9000余元,江西省政府奖金及贷金5000余元,福建省政府奖金800余元,闽西学生救济委员会救济费700余元,学生自助委员会2000余元,母校经常费支付及筹捐3000余元,共计22000余元,基本上解决了全校贫苦学生的生活所需。^[6]两校都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进行自我救助。西南联大学生进入社会各个阶层,担任了各种各样职务;大批厦大学生到长汀中小学兼任教师,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环境下,可以说,办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教育、教学,而在求生。关心并解决师生的生计问题,想方设法保障他们最基础的生存条件,就是最人性化的、以人为本的大学管理。这种管理无形中极大地激发了师生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而然地把师生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营造出和谐向上的精神文化氛围。

(三) 活跃的学术文化

昆明地处“大后方”,与重庆、桂林并称抗战后方三大重镇,人才密集,大学众多,学术交流较频繁,文化氛围甚浓。当时昆明还有同济、云大、中法等高校,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外地文化名流常往来,过从甚密。联大与国际学界也能保持接触与对话,教师有带薪轮休、出国研修和讲学的机会,而外国学者也可以来国内访学、交流(如李约瑟、费正清、休士等)。联大有众多的学术与文化团体,

例如国文学会举办的中国文学系列讲座,担任讲师的有朱自清、沈从文、刘文典、王力、罗庸等教授,哲学系教授冯友兰也应邀讲演“哲学与诗”专题。^[7]联大还有众多座谈会、读书会、讨论会等,开展政治、学术、文艺、体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各种活动。学生活动最活跃时期,几乎每晚上都有演讲、晚会等。每逢星期日或节假日,学生经常结伴出去旅行。月亮好时参加“月亮会”的师生数以千计,听老教授讲故事。^[8]爱好文学的同学定期讨论文学理论问题,成立冬青文艺社。1939年7月,曹禺亲自给联大剧团导演《原野》,孙毓棠任舞台监督还串演常五的角色,闻一多任服装、布景设计。朱自清说,“这个戏的演出确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的一件大事”。^[9]

长汀地处闽西偏僻山区,为孤立的“小后方”。厦大迁至长汀时,全县只有省立长汀初级中学一所,小学也不多,农村还存在许多私塾,厦大是长汀唯一一所大学。“小后方”不仅文化基础较差,且山川险阻,道路崎岖,交通非常不便。与西南联大相比,厦大信息较为闭塞,与外界的学术交流较少。在非常不利于开展学术交流与对话的环境下,长汀厦大想方设法创造出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当时,学校的一些知名教授纷纷在地方报纸上开辟种类颇多的学术性专栏;校长亲自关心并参加学生社团的活动。每个系成立本专业的学会时,萨本栋校长都会亲临学会,支持其发展;全校性社团如铁声歌咏团、诗与木刻社、木屋学会等,更是在萨校长、周辨明教务长、施蛰存、黄开禄等多位著名教授直接帮助下成立并壮大起来的。长汀厦大剧团排演的原创剧目《燕子风沙录》(中文系讲师,后成为台湾著名文学理论家、戏剧家的王梦鸥编剧)1943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优秀话剧奖;同时获奖的有老舍、赵清阁的《桃李春风》、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郭沫若的《南冠草》、曹禺的《蜕变》等13部话剧。^[10]长汀厦大剧团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笔会”是一群爱好文学的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后来冒出了文学家朱伯石、诗人勒公丁、台湾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姚一苇、留美画家朱一雄等大师。

二、吸引和汇集了一批学术大师和优秀学生

大学之大,重在大师。大师最大的心愿是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两校突出的办学成就体现在,一方面集中了一批德高望重、学术造诣很深的知名专家、学者,招揽了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教授,他们全身心投入使学校的教学科学工作中;另一方面吸引了一批渴求知识、不畏艰难的优秀学生。虽然长汀厦大的学术大师和优秀学生在总体数量和水平上不及联大,但也堪称阵容强大,人才辈出。

(一)名师汇集,阵容强大

北大、清华、南开是三所久负盛名的大学,它们的创办时间虽有先后,但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道路,都已经发展成为现代高等学府。三校联合办学形成了一支实力超强的师资梯队,聚合了众多著名大师、专家以及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联大先后共聘教师778位,其中教授290位,副教授48位,基本师资为350位左右。^[11]其师资阵容冠于全国,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

长汀处在闽西偏远地区,要聘请教授十分困难。时任校长萨本栋时常写信或打电报向主持联大校政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请教,并请其推荐教授来校任教。萨本栋以“他个人的声望以及与清华大学和留美的关系,邀请到一批有声望的教授、副教授来校任教”,这其中包括许多联大(清华)的知名学者:傅鹰、黄开禄、朱保训、周长宁、林庚、郑朝宗等。在多方努力下,长汀厦大的师资阵容虽不及联大,也可谓一时之选。文学院既有余霁、李笠、周辨明等教授,又有吴士栋、李培圃、陈景磐、阮康成、张文昌、李庆云、林庚、黄典诚、郑朝宗等中青年学者。理学院萨本栋亲自执鞭,傅鹰、蔡儒生、陈世昌、刘椽、卢嘉锡、汪德耀、谢玉铭、朱家忻等学术造诣很深的专家和后学新锐齐聚一堂。商学院除了有经济学家、院长冯定璋外,也汇集了一批知名学者,如著名的经济学家黄开禄、王亚南、朱保训等。此外,著名文学家施蛰存、历史学家郭宣霖、数理学家周长宁、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时昭涵、生

物学家顾瑞岩、土木工程专家徐人寿、政治学和法学专家邹文海、周楠、陈耀庭等纷纷加盟厦大。^[12]抗战初期,厦大是规模最小的国立大学之一,1938年只有专任教师32名,有的系只有2-3名教师。至1945年,在校专任教师已达100多名,其中教授、副教授50多人。^[13]这些学者多数有在国外一流大学就学经历,深受多种文化熏陶,精通外语,学有所长。

(二) 学生优秀,人才辈出

长汀厦大为了吸引优秀生源,在闽、浙、赣、粤等知名中学推行保送生制度,成绩优异的可不经各考区之考试,径往长汀厦大校本部报到。一批不愿到沦陷的大城市就学的青年学生,想方设法通过封锁线,到厦大来求学。长汀厦大培养的学生成材率之高,也是罕见的。校友产生了谢希德、邓从豪、曾融生、张存浩、林尚安、张启先、艾兴等两院院士,培养出葛家澍、余绪缨、韩国磐等一大批知名学者以及政界和商界的领军人物。1945年台湾光复后,各项建设急需人才。1945-1948年厦大自愿赴台工作的毕业生达300多人,^[14]占毕业生总数的35%。至1949年解放时,厦大学生前往台湾工作的前后近600多人,分布在台北、基隆、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港、台东等地。^[15]1973年,台湾宣布推动其经济腾飞的十大工程,其中七项工程的建设是由长汀厦大校友主持或参与的。许多长汀厦大校友将毕生精力投注于此,为台湾经济腾飞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然,从总体数量和水平上比较,西南联大的学生都超过长汀厦大。为了到联大就读,有些学生宁可舍弃在沦陷区大学的学历,重新报考成为联大学生,如国际知名学者邹谠、李政道,两院院士朱光亚、萧健、李荫远、何炳林、杨起、张滂、高鼎三和龙驭球等,都是联大转学生。^[16]联大学生数量数倍于长汀厦大,联大就读过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17]长汀厦大就读过的学生1863名,毕业生有933名。^[18]联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长汀厦大学生多来自福建以及与其毗邻的江苏、江西、浙江、广东等省。(参见表1、表2)

表1 1942年西南联大学生籍贯人数统计表

省市区	共计	省市区	共计	省市区	共计	省市区	共计	省市区	共计
总计	2760	西康	3	福建	97	热河	3	天津	26
江苏	408	河北	114	广东	363	察哈尔	2	青岛	1
浙江	273	山东	72	广西	35	绥远	4	四川	172
安徽	235	山西	45	云南	287	南京	26	青海	1
江西	65	河南	56	贵州	28	上海	38	黑龙江	2
湖北	160	陕西	9	辽宁	50	北平	6	东特区	4
湖南	246	甘肃	6	吉林	11	威海卫	7		

资料来源:徐心坦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学生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表2 1942年厦门大学生源统计

省市区	共计	省市区	共计	省市区	共计	省市区	共计
总计	281	安徽	3	福建	178	浙江	16
江苏	12	江西	54	广东	17		

资料来源:数据依据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厦大校史资料:第六辑(学生毕业生名录)》,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4-159页。

三、校长的教育理念同中有异

一所大学的成败是与主持校政的教育家紧密相关的。主持联大校政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厦大校长萨本栋都是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他们都是庚款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不同方向上对大学教育理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萨本栋曾在清华任机电工程教授,他深受梅贻琦通才教育理念的影响。萨本栋出任厦大校长时称,“校制悉仿清华,遇事则请示梅校长贻琦先生。”^[19]长汀厦大和联大一样,注重对学生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以自由自在的通才教育辅以严格严谨的治学风气。然而,萨本栋并非完全照搬清华(联大)模式办学,在怎样实施通才教育、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等问题上,萨校长根据长汀厦大自身的条件和特点,在学习梅校长治校理念的同时,也形成了适合本校的教育理念。

(一) 实施通才教育

1. 重视基础理论课。在师资并不充足的情况下,长汀厦大明确规定基础理论课一般都由教授或副教授讲授,并且在基础课中推行以文入理,以理入文,文理渗透。如规定文、法学院各系学生必须在数学及自然科学课程中选修一门;理科学系必须选修中国通史及一门社会科学;商学院各系学生必须修习高等数学等。^[20]同时,许多理工科学生自发到文学院选修或旁听课程。如余贻教授讲“历代文选”,教室内外就挤满了各系学生。比较而言,西南联大由于师资相对充足,在重视基础理论课方面,给予了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联大往往由几个教授同时开一门基础课,比如,“中国通史”就有孙毓棠、吴晗、雷海宗3位教授同时开,而且是从经济、典章制度和文化史等不同的方面来讲授。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国文读本”有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等七八位教授同时或分段开;外国语文学系的“英文读本”和“英文写作”也有陈福田、钱钟书、杨西昆、柳无忌等几位著名教授同时开。^[21]

2. 注重老师的言传身教。从某种意义上说,萨本栋在厦大推行的“导师制”正是梅贻琦“从游论”教育思想的体现。长汀厦大学生经常到导师家里,自由交谈,也常在导师家里吃饭,帮助师母洗菜、洗碗,师生之间关系十分融洽。^[22]联大教授与学生也经常在一起讨论、漫谈,交谈中常涉及专业知识、治学方法,颇有古代书院的风味。北大一位校友说过,“在联大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23]1948年,冯友兰在《文学杂志》3卷5期发表《怀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这段话用于描述长汀厦大的师生关系也是极为恰当的:长汀八年,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也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相濡以沫,共同向学,“又严肃,又快活”的生活状态。

3. 实行主辅修制。萨本栋注重对学校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允许学生在主系之外增修辅系,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和专长。同时,学校对辅系之外应修满的学分有严格的规定,如以中文系为辅修者,必修历代文选、各文体写作、中国文学史、文字学概要等4门课程,并选修其他一门专业课程。增修会计系为辅修者,必须修习经济学、商业史、会计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商法6门课程。^[24]与之不同的是,梅贻琦在对学系所学课程、学习期限及每学期应选的课程门数均有严格规定外,在联大开设了大量选修课,8年内共开设了1600多门课程,其中很多是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选修课程,不受本专业的限制。^[25]

(二) 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

梅贻琦在联大实行教学和科研并重的原则。梅校长认为办大学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抗战中之清华》一文中,他进一步表述为:“近年以来,吾人在平时即认为学校在充实大学本科各系之外,应注重于研究工作之推进。”他先后把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迁至昆明,还“因地方与时势之需要,……添设国情普查及金属学二所”,且“工作已有相当进展”。^[26]许多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有的教授因地制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罗常培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完成了《贡山球语初探》等多种专著。^[27]

在教学与科研关系问题上,限于长汀厦大的资源条件和可能,萨本栋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中心,教师以上课为天职的治校方略。对于教师课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不做任何要求。萨校长对教学的极端重视体现在他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上:在校务极端繁忙的情况下,萨本栋以身作则,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有时上课时数甚至超过一个专职教授的工作量。他开过“普通物理”、“微积分”、“交流电机”、“无线电工程”等课。1942年,土木系缺少“结构学”教授,他向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求助,希望能够代为物色,并且打听清华用的是什么课本,请代为购买。因为他已经做好准备,“如无法找人担任此课,或将由弟自授也”。此外,他还代开过“普通制图学”、“机械制图学”等课,还曾经教过“大一英文”。所以,人们称他为“型”代课者。^[28]在萨校长的影响和感染下,当时教授、副教授集中全力授课。迁汀初期,商学院教师人数少,院长冯定璋教授一个人开设了10门课程,教学工作量超过常规一倍以上。其他教授、副教授每周担任的课时,绝大部分都在10小时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超过20课时。^[29]我们从1945年1月经济系教授黄开禄一周的主要工作和活动,^[30]对当时教授的工作可略见一二(见表3):

表3 1945年1月黄开禄教授一周的主要工作和活动

日期	课程及有关活动
1月15日(星期一)	上午:“经济学”课程(因中途警报,上课时间前后三小时);中午:木屋学会学生来谈活动计划;下午:陈烈甫教授夫人家访
1月16日(星期二)	上午:“经济地理学”课程;下午:警报历时3小时;傍晚:行政会议
1月17日(星期三)	上午:上课(课程名称不祥)、写学报论文
1月18日(星期四)	下午:“经济地理学”课程;傍晚:与学生在府背山散步谈心
1月19日(星期五)	上午:“经济学”课程
1月20日(星期六)	上午:上课(课程名称不祥)、写学报论文;下午:校务会议
1月21日(星期日)	木屋学会之月会活动

萨本栋对教师的科研工作没有硬性规定,各系成立的专业学会也都是学生组织,教师作为学会顾问指导学术讨论。自愿自主地从事科学研究的氛围,激发了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抗战时期厦大的科研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大有斩获。1938年冬,由王亚南和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一批著名学者纷纷自发主编学术期刊:《语言文学导刊》(周辨明主编)、《科学》(谢玉铭主编)、《教育周刊》(李培圃主编)、《商学》(冯定璋主编)、《闽赣话余》(魏应麒主编)、《经济》(黄开禄主编)等,既活跃了学术氛围,同时也提高了教学质量。教师的思想经常在教学和讨论过程中得到学生启发,再传输给学生,教学与科研互动相长。

注释:

- [1] 校史编写组:《厦门大学校史纲要》上编,1986年,第12页。
- [2][13][15][29] 洪永宏编著:《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0、220、263、202页。
- [3]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99-200页。
- [4] 参见赵新林、张国荣:《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王学珍等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
- [5] 参见王学珍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厦门大学台湾校友会编:《厦门大学七十周年校庆特刊》,台北:辉煌企业有限公司承印,1991年。
- [6]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校史资料》(第二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 [7][9][11][16][17][23][27]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6、439、2、69、2、24、323页。
- [8] 王文俊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0页。
- [10] 马俊山:《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 [12] 参见《国立厦门大学新生入学手册》(1942-1946),厦门:国立厦门大学教务处出版组编印,1946年。
- [14] 史习培:《台湾光复后两岸交流专家学者》,《炎黄春秋》2001年第12期。
- [18] 参见翁勇青等编:《厦大校史资料》(学生毕业生名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校友名录编辑组:《厦门大学历届毕业校友名录》第一集,1986年,第10-16页。
- [19] 仲君:《学府人物 萨本栋》,见许乔葵、林鸿禧编:《萨本栋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3页。
- [20][24] 薛成龙:《萨本栋治校方略研究》,见陈武元编:《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 [21] 黄欣:《西南联大课程设置的特点及启示》,《江苏高教》2003年第2期。
- [22][28] 陈孔立:《谈本栋精神》,见陈武元编:《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18页。
- [25] 张思敬等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 [26] 郑华:《试析梅贻琦之大学教育理念》,《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 [30] 参见黄开禄:《风声鹤唳忆厦大——摘自一九四五年初四十八天在长汀之日记》,国立厦门大学台湾校友会编:《国立厦门大学六十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

[责任编辑:洪峻峰]

A Comparative Study of Xiamen University in Changting and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in Kunming

PAN Mao-yuan, SHI Hui-xia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Xiamen University in Changting and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in Kunming were well-known for continuing to produce talents in rear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se two universities were similar in many aspects. Both created a stable and free academic environment,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academics and excellent students, and produced thousands of people with exceptional abilities and skills in spite of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he president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however, believed in basically the same educational ideas thoug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as well. They were marked by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ducation. Comparing and study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ir gains and losse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can further the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such resear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urrent university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Xiamen University,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